



(日) 铃木健二著

李

苑译

神秘的使者 武官

军事译文出版社

神秘的使者——武官

〔日〕铃木健二著
李 苑 译
胡 立 品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铃木健二著

在外武官物語

芙蓉書房

根据日本芙蓉书房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版译出

封面设计：张建明

神秘的使者——武官

〔日〕铃木健二著

李 苑 译

胡 立 品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北京黄寺大街甲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二〇九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7印张 100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93,000册

统一书号：5319—19 定价：0.51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有关武官工作的外国名著，通过一系列曲折、惊险、真实、有趣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日本的一些武官怎样借外交官身份的掩护，采取公开与秘密的手段所完成的特殊使命。对于了解外国武官工作颇有参考价值。

序 言

关于我国把F—15“鹰”式飞机定为下一代主力战斗机一事，由于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说该种飞机“有缺陷”，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我国国内力主由F—14或F—16充任下一代主力战斗机的势力还很强大，因此这个问题不仅在新闻界轰动一时，而且使政府在国会会议上也受到了追究。

事后看来，这个问题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那么，为什么当时防卫厅还为此焦急不安呢？原因是从美国报回的情报很不充分。当时，美国国会记录的副本已经传到了日本新闻界，但防卫厅却未能弄到手。

防卫厅的高级负责人曾责难说：“防卫厅驻外代表干什么去啦！”其实，日本防卫厅驻美国的代表并没有怠于职守。他们没等国内指示下达，当美国报纸一开始报道此事就立刻找美国国会人士索取国会记录去了，同时为了打听布朗部长的真实意思还去了美国国防部。有人问：“这样的事，你们事先会不知道？”当时的防卫厅驻美国代表石田舍雄苦笑不已，答道：“真不是开玩笑，现在的防卫厅驻外代表一天到晚忙于办理订购武器的手续、接待国内来的考察团，简直象日本交通公司的分店，跑腿打杂、应接不暇，根本无法与旧军队的武官相比！”

问题的是非，我们姑且不论。但旧军队的武官，在资金、人力和权力等方面确实与防卫厅驻外代表有天壤之别。

日俄战争时担任驻俄公使馆武官的明石元二郎，从陆军省领取的谍报活动经费多达一百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亿日元。一九三六年，陆军上尉西乡从吾被派往奥地利担任公使馆代理武官（兼驻匈牙利代理武官）时，陆军省给他寄去了一万日元，让他“用这些钱举行一次就职宴会”；而这笔钱折合成现在的钱，则相当于一千万日元。可是，现在的防卫厅驻外代表在与各国武官交往时，要举行一次便宴都必须痛解私囊。我想，在他们当中，恐怕有人会非常羡慕旧军队武官用钱之方便。

从武官处的地位、人员来看，防卫厅驻外代表与旧军队武官也是无法相比的。旧军队的陆军武官和海军武官，都有各自的武官处，其地盘之大、设备之全可与大使馆相媲美。每个武官处都配有许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曾担任过驻德大使馆海军武官的小岛秀雄说：“我们武官处拥有副武官、技师、会计、秘书等，共三十人左右。”而现在的防卫厅驻外代表，除在美国、苏联和南朝鲜三个国家和地区有二人以上外，其他国家都是一名驻外代表统管陆海空三军的事务。

至于旧军队武官的权力，这里就没必要多加赘述了。我们不必以驻德大使馆陆军武官大岛浩为例——他曾不顾外务省的反対，拚命为日、德、意三国结盟而奔走，结果使我国误入歧途——，即可断言，旧军队的武官，特别是在昭和年代的外交史中曾扮演过主要角色。

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不是描绘战前武官的显耀历史，也不是诉说战后防卫厅驻外代表的残酷现实。过去，由于大使馆和武官处各自为政，实在是祸国乱政。现在，决不能让那种愚蠢的二元化外交故伎重演。然而，在人们已经使用

人造卫星来侦察对方秘密的今天，007号谍报员（注）的故事也正在变得只能作为电影供人欣赏。

可是，虽然我们没必要搬出前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有关“兔子耳朵”的理论，我国作为一个坚持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小国，仍须对国际军事形势的变化具有小国的敏感。这并非是要单纯地加强防卫厅驻外代表的职能，而是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以防卫厅驻外代表为触角的系统的情报体制。

诚然，防卫厅驻外代表人数多了，未必就好。但是，我们处于情报过剩的时代，特别需要的是，在注意不胡乱搜集的同时，应该积累和分析那些我们所得到的情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系统的情报搜集指导体制。笔者撰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解探索这一问题。

（注）007号谍报员是英国一部间谍系列影片的主人公——译注。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武官论 (1)

一、武官制度的产生 (1)

二、日本武官制度的历史 (3)

三、战后防卫厅驻外代表制度的建立 (10)

第二章 战前篇 (14)

一、典型的武官明石元二郎 (14)

二、军人外交的登峰造极者大岛浩 (32)

三、劳而无功的武官小野寺信 (54)

四、“悲剧大使”野村吉三郎 (74)

第三章 战后篇 (98)

一、首批防卫厅驻外代表的苦恼 (98)

二、缺乏吸引力的防卫厅驻外代表职务 (110)

三、防卫厅驻外代表制度的改革 (120)

四、防卫厅驻外代表制度的展望 (128)

后记 (141)

第一章 武官论

一、武官制度的产生

所谓武官，就是派驻国外执行公务的军人，亦可称为身着军服的外交官。武官的身份是外交官，在外交场合代表本国军队。但武官的任务则是调查搜集驻在国军事等方面的情报。所谓武官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向外国打开窗口、促进彼此交流的制度；而有关军事组织的内部情况，每个国家往往以军事机密为借口，对本国国民都加以封锁。那么这种武官制度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派遣间谍搜集情报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样悠久。被蒙哥马利元帅推崇为伟大将军的莫泽，同时也是一名卓越的情报军官。他和犹太人一起流浪于荒野的时候，受命于天神去探访迦南乐土。当时，莫泽从各个部落里选拔了十二名侦探派往迦南。临行前，他对侦探们说：

“你们到了内格夫，要登上山顶，观察那里的情况：居住在那里的人，力量是强还是弱？数量是多还是少？另外，他们居住的土地是好还是差？人们居住在毡房里、还是筑有城墙的市街上？那里的土地是肥沃还是贫脊？那里有没有树木？你们要勇敢点，采些当地的水果回来。”

莫泽的命令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侦察的要领。尤其是最后附加的那条：要带回水果作为证据，说明莫泽猜透了侦探们的心里。四十天后，侦探们手里拎着许多葡萄、石榴和

无花果等回来报告，从而证明迦南那块土地跟西奈、帕兰（音译）等地区的荒野不同，是一块“流淌着乳液和蜜汁”的沃土。

然而，若谈到情报技术理论，应该说还是东方比较发达。孙子的间谍理论脍炙人口，西方情报书籍无不引用。孙子说过：“情报的取得，既不能靠乞灵鬼神，也不能靠占卜算卦，而只能靠人去调查。”他还主张，作为其手段可利用的间谍有以下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和生间。

孙子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这五种间谍，彼此之间当然互不知情，甚至他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任务和目的。孙子说，统管他们的是“君主”。

可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情报机关多半是为国王或君主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其次才是军事目的。西德的盖伦机关的头头赖因哈特·盖伦说过：

“人们说，秘密机关第一个目的是为军事目的服务。但我认为，这个主张是错误的。我们从历史事实也可以得到证实：六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除拜占廷帝国外，其他国家在长达九百年的时间里，连可供间谍侦探的常备军都没有。”

至于“公开间谍”制度，只是到了现代才正式建立。但其萌芽却可追溯到十五世纪。当时，意大利境内的城邦诸侯向外国宫廷和政府派驻了常设代表机构。据说，驻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谍报机关甚至使用了密码和密写。当时在驻外使馆中是否已有大公使和武官的区分，尚不清楚；可能是文武官员混杂在一起，共同担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情报的搜集任务。因而，驻外使馆实际上起着情报网据点的作用。

后来，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弗雷德里克国王等欧洲国家的王公君主都仿效了意大利的作法。从此，间谍战便半公开化和制度化了。路易十一在欧洲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大规模和常设的间谍网。弗雷德里克国王除派首席大使外，还秘密派去情报人员专门负责情报搜集。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指出当时的情报是很有价值的。他说：

“如果让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十七世纪的情报活动很成功，那么我要举瑞典为例。……只要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时期的瑞典和荷兰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弱小国家曾经何等重视情报活动，并在技术和组织上狠下功夫，从而弥补了它们实力上的劣势。”

随着情报在军事上越来越受重视和军队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大，军事情报和政治情报开始分开，并转由军队自己进行搜集。这便是武官制度的诞生。武官制度在欧洲确立于拿破仑时代。美国稍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向驻外使馆派驻陆、海军武官。尤其是拿破仑，对情报搜集简直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如果不掌握敌军司令官的全部情况，包括他们的脾气秉性，拿破仑甚至会坐立不安。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在《斗智》一书中这样写道：

“拿破仑的情报参谋必须为拿破仑搞来有关敌军每一位将军的性格和癖好等一切情报。”

二、日本武官制度的历史

日本的武官制度始建于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首批武官有驻清朝的福原和胜陆军上校和驻德国的桂太郎陆军少校。海军武官派出的时间稍晚，一八八〇年日本才派海军上尉高田政久担任驻俄国武官，派海军上校黑冈带刀任驻英国

武官。具体说来，建议向大使馆派驻武官的正是桂太郎本人。当时，他向陆军大臣山县有朋陈述：

“如欲改革陆军兵制，邀聘欧洲良师，固为重要。但须知选拔我邦有为之士赴欧，实更为至要。且其人选如属循常书生，探求政府部内诸情恐多困难，宜遣具备适当方便条件、并有相当经验之武官，令其搜集各种情况，分析对比，探讨研究，取得我陆军改革之必要资料。”

山县同意其建议后，桂太郎立即毛遂自荐道：“恐怕其他合适人选为数不少，但我愿充此职。”后来，桂太郎得到一个绰号，叫做“帮闲武士”。这可以说是他一次活龙活现的表演。

一八七五年三月三十日，当桂太郎即将离开东京前往日本驻德国公使馆任职时，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交给了他一份工作守则。山县在这份工作守则中下达了两大原则：武官“须遵守公使馆纪律，事事经公使许可，不可独断专行”；工作报告“应通过公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之联络途径”呈送国内。这就是说，外交是天皇的大权，由外务省统管，所以尽管武官是军人，也必须听命于公使指挥。显而易见，这是彻头彻尾的外交一元化原则。然而，在明治时代后期和大正、昭和年代，日本出现了军人干涉外交的现象。为与此相比较，我想在这里全文载录山县这份富于启发性的工作守则。

凡陆军参谋部军官在公使馆任职、常驻缔交之国，即或出外旅游观光，亦须完全置于所在公使馆公使领导之下；其所能享受之一切权力应与公使馆其他工作人员相同，不得有任何特殊。平素既须认真以此体现天皇陛下与驻在国君主友好交往之信义；同时应谨言慎行，万不可有损于本邦国格及公使名誉，言谈举止不可粗鲁。尤

其是身为武官者，更要安分守己、廉洁奉公；一言一行须考虑到我陆军名誉，不可放任。在驻外期间，起居外出皆应遵守公使馆纪律，事事须经公使允许，不可独断专行。在调查驻在国情况时，与其军事制度、战术相比，更应注重了解其军事地理及军队之政治态度，并按以往在参谋科学习之方法，进行实地试验。此外，还应特别注意驻在国与其他国家之外交关系，并将其利害关系和实力强弱等情况呈报国内。

所有呈送本大臣之报告，应通过公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之联络途径。一般报告与特别报告，应加以区分。一般报告要编号，无论有无紧急情况，皆须按顺序报回。如若出现战乱等情况，应采用特别报告之形式。特别报告须另行编号，并按顺序报回。若本大臣下令需要特别报告时，武官应勤勉尽职，悉察其详委。若事关武器问题，或新装备，应将众说异议统统报回，不可遗漏。

凡及视察事宜，有时可能触及驻在国之嫌忌。为避免此类情况发生，遇事须由公使三思决定。

以上各项，须认真执行，勤谨公务。

致日本驻德公使馆武官 桂太郎陆军少校

陆军大臣 山县有朋

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遗憾的是，山县制订的这份工作守则的精神实质，竟然逐渐被其后的军人所阉割。开始时，武官直接向陆军省和海军省申请活动经费，后来发展到武官直接与陆军参谋部及海军军令部进行书信来往；至此，山县制订的工作守则便彻底变成了一纸空文。

譬如，一九〇二年，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曾交给即将赴美担任公使馆海军武官的海军少校竹下勇一份新的工作守则。守则说：“应遵守公使馆纪律，事事须经公使允许，不可独断专行。”这部分确实完全继承了山县工作守则的精神。但是，山本权兵卫在工作守则中又说：“有关谍报及购买图书手续等事宜，皆须接受军令部长指挥。”这就明确表示了武官在从事谍报工作时必须听命于军令部长。另外，关于武官公函传递问题，山本的工作守则说：“驻外工作期间，虽可与我海军各部局长进行直接公函来往，但不得密封，应经军令部转交。”这就是说，完全没必要象山县说的那样，“应通过公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之联络途径”。

一九一〇年，根据前述陆海军大臣亲手发给各个武官的工作守则，日本制订了《大、公使馆陆海军武官工作章程》。到一九一六年，日本建立了副武官制度，因此形成了《大、公使馆陆海军武官及副武官工作章程》。明确规定：武官的活动经费、通信、领导关系均由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军令部负责。现将海军武官的工作章程转载如下：

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副武官工作章程

(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第一百六十九号命令)

(修订：一九三三年第三十七号、一九三九年第五百八十四号)

第一条 本章程系大使馆或公使馆海军武官及副武官驻外期间之工作守则。

第二条 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及副武官之军职身份由军令部长管理，但一般训令则由海军大臣下达。大使馆、公

使馆海军武官驻外期间行动应接受大使或公使领导，与其他外交官无异。此外，副武官属大、公使馆海军武官领导，在驻在国享受与他国副武官同等的待遇。

第三条 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在日常工作中应遵守使馆规章制度。凡关系到外国政府之事宜，须禀报大使或公使，取得同意后再行处理。副武官应在海军武官领导下工作。

第四条 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欲对驻在国进行考察时，应预先将考察题目及地点禀报大使或公使，经同意后方可实施。此外，考察时须注意不可损害驻在国官民之感情，不可触及禁忌，遇事应慎重处理。

必要时，经大使或公使同意，海军武官可命副武官对驻在国进行考察。

第五条 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及副武官，除特别规定外，应住在大使馆、公使馆内。若因工作及其他方面原因需要迁移驻地时，须申述理由，并取得军令部长批准。同时，还须事先征得大使或公使同意。

第六条 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及副武官驻外期间，外出旅行三十六小时以上时，须申报理由及旅费概算额，经军令部长认可后方可实施。如情况紧急无法事先请示，须事后报告履行批准手续。

第七条 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若遇有对帝国海军有用之图书等，在采购和邮寄时须直接与军令部及海军文库交涉决定。

第八条 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因公事可直接与海军各局进行通信联络。但有关谍报事宜的公函须经军令部转交，不得密封。

第九条 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为从事谍报及宣传工作，

可分别运用日本驻当地之造船军械总监督，或造船监督、军械监督，以及负责造船、军械、财务之军官或燃料监督军官。

第十条 上述各条未涉及的一些驻外工作细节问题，或因军事需要而临时进行的特殊工作，军令部长将随时对大使馆、公使馆海军武官和副武官直接下达训示。

上述章程制订后，驻外武官便成了优秀军官晋升的必由之路。反过来讲，一名军官若未担任过武官，他的晋级将会受到限制。这个道理，从一些武官后来的职务上，也可以得到证明；他们有的当上了大臣，有的担任了次官、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等要职。

譬如陆军的桂太郎（1875年3月至1878年7月任驻德国武官）、寺内正毅（1883年5月至1886年1月任驻法国武官）、杉山元（1915年2月至1918年10月任驻印度武官）、梅津美治郎（1919年11月至1921年6月任驻瑞士武官）、山下奉文（1927年2月至1929年8月任驻奥地利武官）、板垣征四郎（1934年12月至1936年3月任驻满洲国武官），海军的斋藤实（1884年9月至1888年2月任驻美国武官）、岛田繁太郎（1917年12月至1919年3月任驻意大利武官）、永野修身（1920年12月至1923年11月任驻美国武官）、米内光政（1920年6月至1922年12月任驻苏联武官）、丰田贞次郎（1923年11月至1926年12月任驻英国武官）、山本五十六（1925年12月至1927年11月任驻美国武官）等杰出人物都担任过武官。甚至可以说，被派往国外任武官的人都是尖子里的尖子。

关于当时派遣留学生是何等地重视学业水平，据岛田谨二说：

“从江戸幕府末期到明治时代,日本海军曾广泛选派优秀人才到先进国家留学,并通过这样的方法建立起了具有独特的组织、体制和强大的日本海军。一八七九年初,日本决定恢复派遣留学生制度,于是暂时向英、法、德、美、俄等五国,派出了年轻有为的海军军官。……去英国留学的是一八八九九年海军学校应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优等生财部彪上尉;去法国的是一八八五年应届毕业生的第二名村上格一上尉;去德国的是一八八五年应届毕业生的第三名林三子雄上尉;去美国的是一八九〇年应届毕业生的第一名秋山真之上尉。这些人都是几经挑选的俊秀。但在遴选去俄国留学的人选时,却内定了海军上尉广瀨武夫。……他在八十名毕业生中成绩名列第六十四位,这使众人(包括军务局长山本权兵卫)大为吃惊。当时,连山本也感到犹豫不决,不知所措。”

这些留学生经过几年留学,开始在使馆工作。回国后,便进陆军或海军省任职,取得一定经验,再派到国外担任副武官,继而晋升武官。虽然其中许多人从未体验过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生活,但他们仍然很快被晋升为将军。这些作为优秀军官的武官,使日本军队产生了两个弱点。其一,武官制度的发展未能使武官成为搜集情报的手段。当然,这也是日本军队重视作战、轻视情报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武官成了优秀军官晋升的一个阶梯,所以这一职务必然要变成武官个人进修的一种闲职。

其二,使军内形成了亲德和亲美等派系。由于武官(包括留学时代)长期生活在一个国家,很容易对那个国家产生亲切感,从而使情报也带有某种倾向性。当时,驻德、俄的武官一般从陆军中选派,驻英、驻美武官则从海军中挑选。结果,驻德、俄的武官后来成为陆军的极右翼,驻英、美武官